

中国古代哲学史

胡适著译精品选
● 胡适 / 著



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
疑將人要有疑處
不是

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中国

古代哲学史

胡适著译精品选
胡适 / 著

ZHONGGUO

GUIDAI

ZHEXUESHI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哲学史/胡适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
1999.10

(胡适著译精品选)

ISBN 7-5336-2301-0

I. 中… II. 胡… III. 哲学史-中国-古代 IV. 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2243 号

责任编辑:张崇贵

装帧设计:包云鸪 吴亢宗 王为民 黄彦

出版发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排 版: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

印 刷:合肥晓星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12.875

字 数:230 000

版 次: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3 000

定 价:19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(0551)2651321

邮 编:230061

出 版 说 明

胡适著述甚丰，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。为满足读者的需要，本社在出版《胡适全集》之前，先行出版胡适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（译）作。这些著（译）作的出版，或采用初版作底本，或依据较善版本排印；个别有误植、脱字、衍字之处，均予改正。

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》，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。1929年本书收入“万有文库”，改名为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。195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改版发行。1986年7月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收入《胡适作品集》第31集。1991年12月，北京中华书局收入“中国近代人物文集”丛书。

本书在整理过程中，吸收了一些胡适著作整理和研究成果，谨致谢意！

1999年6月

序

~~~~~

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，有两层难处。第一是材料问题：周秦的书，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。就是真的，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。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“汉学”的一步工夫，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。第二是形式问题：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。《庄子》的《天下篇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六艺略》、《诸子略》，均是平行的记述。我们要编成系统，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，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。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，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。

现在治过“汉学”的人虽还不少，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。留学西洋的学生，治哲学的，本没有几人。这几人中，能兼治“汉

学”的更少了。适之先生生于世传“汉学”的绩溪胡氏，稟有“汉学”的遗传性；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，还能自修“汉学”，至今不辍；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、哲学，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。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，一到先生手里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。

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，才满一年。此一年的短时期中，成了这一编《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》，可算是心灵手敏了。我曾细细读了一遍，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：

**第一，是证明的方法** 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，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，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；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，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；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，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。适之先生这《大纲》中此三部分的研究，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，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，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。

**第二，是扼要的手段** 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、孔子之前，是无可疑的。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、一半政史的记载中，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，编成系统，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。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，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，所以截断众流，从老子、孔子讲起。这是何等手段！

第三，是平等的眼光 古代评判哲学的，不是墨非儒，就是儒非墨。且同是儒家，荀子非孟子，崇拜孟子的人，又非荀子。汉宋儒者，崇拜孔子，排斥诸子；近人替诸子抱不平，又有意嘲弄孔子。这都是闹意气罢了！适之先生此编，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，各有各的长处，各有各的短处，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，是很平等的。

第四，是系统的研究 古人记学术的，都用平行法，我已说过了。适之先生此编，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，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，便是从老子到韩非，古人划分做道家 and 儒、墨、名、法等家的，一经排比时代，比较论旨，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。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。

以上四种特长，是较大的，其他较小的长处，读的人自能领会，我不必赘说了。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，由上古而中古，而近世，编成一部完全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、一半庞杂的哲学界，理出一个头绪来，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，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！

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

蔡 元 培

## 再版自序

---

一部哲学的书，在这个时代，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，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。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，使我心里欢喜感谢，自不消说得。

这部书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，到今年二月出版时，我自己的见解已有几处和这书不同了。近来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讨论这部书的内容，有几点我很佩服。我本想把这几处修正了然后再版。但是这时候各处需要这书的人很多，我又一时分不出工夫来做修正的事，所以只好暂时先把原版重印。这是我很抱歉的事。（有一两处已在正误表里改正。又关于《墨辩》的一部分，我很希望读者能参看《北京大学月刊》第三期里我的《〈墨子·小取篇〉新诂》一篇。）

我做这部书，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：王怀祖、王伯申、俞荫甫、孙仲容四个人。对于近人，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。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，钱玄同、朱遇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。这书排印校稿的时候，我正奔丧回家去了，多亏得高一涵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替我校对，我很感谢他们。

民国八年五月三日

胡 适

## 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台北版自记

---

这本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就是我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》，民国七年九月写成付印，民国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。今年是民国四十七年，这部书出版以来，整整三十九年了。台北商务印书馆现在用“万有文库”的五号字本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重印，仍用“中国古代哲学史”的名称。我做了一个正误表，附在卷尾。

“万有文库”本是民国十八年用五号字重排的（原书是用四号字排的）。那时候，我在上海正着手写《中国中古思想史》的“长编”，已决定不用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”的名称了。所以当时《万有文库》的编辑人要把我的哲学史上卷收在那部丛书里，我就提议，把这个五

号字重排本改称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。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单独流行，将来我写完了“中古思想史”和“近世思想史”之后，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“中国古代思想史”，我不预备修改这本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了。

我现在翻看我四十年前写成的这本书，当然可以看出许多缺点。我可以举出几组例子：

一、我当时还相信孔子做过“删诗书，订礼乐”的工作，这大概是错的。我在正误表里，已把这一类的话都删去了。

二、我当时用《列子》里的《杨朱篇》来代表杨朱的思想，这也是错的。《列子》是一部东晋时人伪造的书，其中如《说符篇》好像摘抄了一些先秦的语句，但《杨朱篇》似乎很不可信。请读者看看我的《读〈吕氏春秋〉》（收在《胡适文存》三集）。我觉得《吕氏春秋》的《本生》、《重己》、《贵生》、《情欲》诸篇很可以表现中国古代产生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，大可以不必用《列子》的《杨朱篇》了。《吕氏春秋·不二篇》说“杨生贵己”，李善注《文选》引作“杨朱贵己”。我现在相信《吕氏春秋》的“贵生”、“重己”的理论很可能就是杨朱一派的“贵己”主义。

三、此书第九篇第一章论《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》，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，其中有一节述“《列子》书中的生物进化论”，也曾引用《列子》伪书，更是违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里提倡的“史料若不可靠，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”的原则。我在那一章里述“《庄子》书中的生物进化论”，用的材料，下的结论，现在看来，都大有问题。例如，《庄子·寓言篇》说：

万物皆种也，以不同形相禅。始卒若环，莫知其伦。  
是谓天均。

这一段本不好懂。但看“始卒若环，莫知其伦”八个字，这里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论罢了。我在当时竟说：

“万物皆种也，以不同形相禅”，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“物种由来”。

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，真是侮辱了《物种由来》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！

我现在让台北商务印书馆把我这本四十年前的旧书重印出来，这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，究竟还有他自身的特别立场，特别方法，也许还可以补充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几部中国哲学史的看法。

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“名学方法”（逻辑方法，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），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。我在第八篇里曾说：

古代本没有什么“名家”。无论那一家的哲学，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。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。所以老子要无名，孔子要正名，墨子说言有三表，……这都是各家的名学。因为家家都有“名学”，所以没有什么“名家”。

这个看法，我认为根本不错。试看近世思想史上，程、朱、

陆、王的争论，岂不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？朱晦菴把“格物”解作“即物而穷其理”，王阳明把“格物”解作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”，这岂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学方法的争论吗？南宋的朱陆之争，当时已认作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两条路子的不同，——那也是一个方法上的争执。两宋以来，“格物”两个字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，其实多数也还是方法上的不同。

所以我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，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。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，很少人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。

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承认司马谈把古代思想分作“六家”的办法。我不承认古代有什么“道家”、“名家”、“法家”的名称。我这本书里从没有用“道家”二字，因为“道家”之名是先秦古书里从没有见过的。我也不信古代有“法家”的名称，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“所谓法家”的标题，在那一章里我明说：“古代本没有什么‘法家’。……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，只有法治的学说，并无所谓‘法家’。”至于刘向、刘歆父子分的“九流”，我当然更不承认了。

这样推翻“六家”、“九流”的旧说，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，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，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個目标。我的成绩也许没有做到我的期望，但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。

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，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讲起的。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，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、孔子讲起，几乎引起了班

上学生的抗议风潮！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，他还得特别提出“从老子、孔子讲起”这一点，说是“截断众流”的手段。其实他老人家是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。

四十年来，有些学者们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。他们要进一步，把老子那个人和《老子》那部书都推翻，都移后两三百年。他们讲中国哲学思想，要从孔子讲起。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就是这样办的。冯先生的书里，先讲了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杨朱、陈仲子、许行、告子、尹文、宋钜、彭蒙、田骈、慎到、驺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，——到了第八章才提出“《老子》及道家中之老学”。

冯先生说：

《老子》一书，……系战国时人所作。关于此说之证据，前人已详举（原注：参看崔东壁《洙泗考信录》、汪中《老子考异》、梁启超《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），兹不赘述。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，亦可见《老子》为战国时之作品。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，故《老子》不能早于《论语》。二则《老子》之文体非问答体，故应在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后。三则《老子》之文为简明之“经”体，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。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，若任举其一，则不免有违逻辑所谓“丐词”（Begging the question）之嫌。但合而观之，则《老子》之文体、学说，及各方面之旁证，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，此则必非偶然矣。（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民国三十六年增订八版，页二一〇。）

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，都不成证据。我曾对他说：

……积聚了许多“逻辑上所谓‘丐辞’”，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！这种考据方法，我不能不替老子和《老子》书喊一声“青天大老爷，小的有冤枉上诉！”聚蚊可以成雷，但究竟是蚊不是雷。证人自己承认的“丐辞”，究竟是“丐辞”，不是证据。

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。我到今天，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。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《老子》这部书挪移到战国后期去。（留心这个问题的人，可以看看我的《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》及附录。这些文字收在《胡适论学近著》，页一〇三以下；即台北版《胡适文存》四集，页一〇四以下。）

二三十年过去了，我多吃了几担米，长了一点经验。有一天，我忽然大觉大悟了！我忽然明白：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，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！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，他们诚心相信，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，当然要认孔子是“万世师表”。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一个老子。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。

试看冯友兰先生如何说法：

……在中国哲学史中，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。后世尊为惟一师表，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。以此之故，哲学史自

孔子讲起。(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页二九。)

懂得了“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”的心理，我才恍然大悟：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的长文讨论《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》真是白费心思，白费精力了。

民国四十七年一月十日

在纽约寓楼

## 目 录

---

[ 1 ] 序 (蔡元培)

[ 1 ] 再版自序

[ 1 ] 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台北版自记

[ 1 ] 第一篇 导 言

[29] 第二篇 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

[31] 第一章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

[39] 第二章 那时代的思潮 (诗人时代)

[43] 第三篇 老 子

[65] 第四篇 孔 子

[67] 第一章 孔子略传

[71] 第二章 孔子的时代

[77] 第三章 易

[91] 第四章 正名主义

[103] 第五章 一以贯之